

## 江上波夫如何以「騎馬遊牧民族」 重構東亞史、日本史、世界史論述

蔡長廷\*

日本東洋史是明治維新以來發展的新學科，發展之初的核心是中國史，隨著白鳥庫吉對朝鮮、滿洲、蒙古的深入研究，提出東洋史是在農耕民與遊牧民的南北對抗中發展。江上波夫是北亞遊牧民史第三世代的研究者，專長是東洋考古學，由 1931-1945 間的滿蒙考古調查的累積，在戰後 1948 年 5 月出版《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提出「騎馬遊牧民族」概念，延伸白鳥庫吉的南北對抗論，在東亞史視角下考察日本民族與國家的形成。同年 8 月他在「日本民族文化源流與日本國家形成」座談會提出大和王朝的統治者是來自東北亞的騎馬遊牧民，被稱為「騎馬民族征服日本說」，引起討論熱潮。1951-1967 年間，他從近東考古調查中深化「騎馬遊牧民族」概念，同年 11 月出版《騎馬民族国家》，完善自身學說的同時，認為「騎馬遊牧民族」與「定居農耕民族」概念能用於考察世界史。由此可看出，日本歷史學界在戰後除了以馬克思唯物史觀重新建構歷史外，江上波夫從「騎馬遊牧民族」建構對東亞史、日本史、世界史的理解。

關鍵詞：江上波夫、騎馬遊牧民族、南北對抗論、東亞史、日本史、世界史

---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外國人共同研究者

## 一、前言

江上波夫(1906-2002)是日本戰後具代表性的北亞史研究者之一，其代表著作包括《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1948)、《ユウラシア古代北方文化》(1948)、《騎馬民族国家》(1967)等。治學特色是從考古學、歷史學材料出發，用民族學的比較方法探討北亞騎馬遊牧民歷史，以及日本民族與國家的起源。本文探討江上波夫如何發展「騎馬遊牧民」概念，提出「騎馬遊牧民日本征服說」，以貫穿對於東亞史、日本史、世界史的理解。

日文學界對本文主題討論較少，史學史專著以日本史研究為主，<sup>1</sup>對東洋史研究的討論直到近年才日漸增多。相關論著從聚焦於明治末期至大正年間的東洋史創立期，逐漸往下延伸到大正至昭和初期的滿鮮史研究，<sup>2</sup>另透過東洋史學者的傳記，以及學友、學生對師長的

---

1 提及戰後學術史的專著，有：芳賀登，《批判近代日本史学思想史》(東京：柏書房，1974)；永原慶二，《20世紀日本の歴史学》(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遠山茂樹，《戦後の歴史学と歴史意識》(東京：岩波書店，1968)。

2 中見立夫的〈日本的「東洋学」の形成と構図〉、吉澤誠一郎的〈東洋史学の形成と中國——桑原隲蔵の場合〉，收入山本武利等編，《岩波講座「帝國」日本の學知第3卷東洋學の磁場》(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13-54、55-98；吉開將人，〈東亞考古学と近代中国〉，收入山本武利等編，《岩波講座「帝國」日本の學知第3卷東洋學の磁場》(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135-174；井上直樹，《帝国日本と「滿鮮史」：大陸政策と朝鮮・滿州認識》(東京：塙書房，2013)；毛利英介，〈滿洲史と東北史のあいだ：稲葉岩吉と金毓黻の交流より〉，《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48(吹田，2015)，頁343-363；井上直樹，〈滿洲国と滿洲史研究：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所蔵文書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京都府立大学学術報告人文》，70(京都，2018)，頁157-175。

口述訪談，可以了解其發展趨勢，<sup>3</sup>而江上波夫的三本自傳更是本文的重要參考資料。<sup>4</sup>齋藤孝與增淵龍夫從日本人的世界觀與歷史意識切入，前者認為自 1853 年美國艦隊叩關後，日本人認知到歐美與亞洲的區別，影響了歷史學三分體制——日本、東洋、西洋，日本史是自我意識的呈現，西洋史是以西洋為師的探索，而東洋史對於從西洋學習到方法的日本來說，是要研究的對象。東洋史的核心最初主要是中國史，其他地域之後也隨著日本的擴張而成為研究客體；隨著戰敗，國際觀也跟著改變，重新學習西洋，反省對東洋的認識。<sup>5</sup>後者則指出東洋史研究者不斷地將中國與日本做為彼此的參照，藉此發展出截然不同的中日歷史認識。<sup>6</sup>中文學界除翻譯日本學界成果外，多集中

3 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系譜》(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系譜(第2集)》(東京：大修館書店，1994)；高田時雄編，《東洋學の系譜〈歐米篇〉》(東京：大修館書店，1996)；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學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今谷明等編，《20世紀の歴史學家たち》(1)日本編上(東京：刀水書房，1997)；今谷明等編，《20世紀の歴史學家たち》(2)日本編下(東京：刀水書房，1999)；今谷明等編，《20世紀の歴史學家たち》(3)世界編上(東京：刀水書房，1999)；今谷明等編，《20世紀の歴史學家たち》(4)世界編下(東京：刀水書房，2001)；今谷明等編，《20世紀の歴史學家たち》(5)日本編續(東京：刀水書房，2006)；尾形勇等編、岸本美緒責任編集，《歴史學事典5 歴史家とその作品》(東京：弘文堂，1997)；財団法人東方學會編，《東方學回想(I-IX)》(東京：刀水書房，2000)。

4 1985 年出版的《學問の探検》，之後以〈わが生き立つの記〉為題，收入其 1986 年出版的著作集別卷，所以自傳共有兩種。參見江上波夫，《學問の探検》(東京：佼成出版社，1985)；江上波夫，〈わが生き立つの記〉，收入江上波夫，《江上波夫著作集別卷》(東京：平凡社，1986)，頁 209-359；江上波夫，《學問と夢と騎馬民族》(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1995)。

5 齋藤孝，《歴史學の周辺》(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9)，〈日本人の國際感覺〉，頁 193、196-197。

6 增淵龍夫，《歴史家の同時代史的考察について》(東京：岩波書店，1983)，頁 46。

於明治末期的東洋史創設期，或對戰後中國史研究的論述，以及通論性的著作如《日本漢學史》；對於個別學者的研究，則以具代表性的內藤湖南、桑原鷺藏、宮崎市定等學者為多。<sup>7</sup>至於本文涉及課題，目前仍無研究。

關於戰爭期(1931-1945)的學術史研究，坂誥秀一考察太平洋戰爭時期(1941-1945)中日共同成立的東亞考古學協會、東方考古學協會，他認為此類在殖民地發展的考古學組織，是培養江上波夫等東洋考古學者的重要場域，<sup>8</sup>相關課題如吉開將人、桑兵等學者也有討論。<sup>9</sup>阿部猛考察太平洋戰爭時期歷史學的發展，在皇國史觀佔主流的氛圍下，日本史研究如何根據政府的需要提供論述。<sup>10</sup>中生勝美認為上波夫任職的民族研究所與政府、軍部的關係相當密切，研究者也在知情下進行民族政策研究，以供政府、軍部為建設大東亞共榮圈參考，但研究方

7 中文學界目前將江上波夫編著《東洋學の系譜》翻譯出版，研究成果則有高明士，《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臺北：東昇出版公司，1982)；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北京：中華書局，2007)；李慶，《日本漢學史(修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白永瑞，〈「東洋史學」的誕生與衰退——東亞學術制度的傳播與變形〉，《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9(臺北：2005)，頁 269-294；嚴紹溥，《日本中國學史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邵軒磊，〈戰前東洋史學之觀念與知識系譜〉，《東亞觀念史集刊》，3(臺北，2012)，頁 335-360。

8 坂誥秀一，〈日本考古學史拾遺——東亞考古学会・東方考古学協会と日本古代文化学会〉，《立正大学文学部論叢》，99(東京，1994)，頁 31-57；坂誥秀一，〈続日本考古學史拾遺：「大東亞共榮圈」の考古学〉，《立正大学文学部研究紀要》，11(東京，1995)，頁 1-16；坂誥秀一，《太平洋戦争と考古学》(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年)。

9 吉開將人，〈東亞考古学と近代中国〉，頁 135-174；桑兵，〈東方考古学協會述論〉，《歴史研究》，2000：5(北京，2000)，頁 160-169。

10 阿部猛，《太平洋戦争と歴史学》(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

面卻維持相當的自由。<sup>11</sup>

由此可見，東洋史研究的學術史仍有發展空間，而東洋史的核心除了中國史，還有北亞史。白鳥庫吉便指出，北亞阿爾泰語系的騎馬遊牧民是日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成分，<sup>12</sup>此類將北亞與日本彼此參照也是東洋史研究的重要取徑之一。中國與日本的參照，多是文化互動關係；北亞與日本的參照，除了文化互動，更涉及到兩者在民族與人種互動關係。小熊英二整體考察明治維新以來的各種日本民族起源論，僅簡略提及江上波夫的論點；<sup>13</sup>工藤雅樹則整理江上波夫學說引起的論爭，並未提出個人觀點。<sup>14</sup>雖然中文學界已將江上波夫的《騎馬民族國家》譯成中文，但相關討論仍極為有限。<sup>15</sup>

故本文選擇學術生涯橫跨戰前、戰後的江上波夫，首先論述他求學至取得研究職務的時代氛圍、成長過程。接著分析《アジア・民族文化の形成》的內容與特色，探索此書與東亞史、北亞史研究的承接關係，以及對之後北亞史研究造成的影響。再分析 1967 年出版的《騎馬民族國家》，如何連結北亞史與日本史，及其對日本人的文化源流之見解。最後，考察他如何利用「騎馬遊牧民」概念，重新建構世界史。

11 中生勝美，《近代日本の人類学史：帝国と植民地の記憶》（東京：風響社，2016），〈第 5 章民族研究所：戦時中の日本民族学〉，頁 317-370。

12 白鳥庫吉，〈日本民族論〉，收入白鳥庫吉，《白鳥庫吉全集第九卷アジア史論下》（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 212-213；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88-89；小熊英二，《單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東京：新曜社，1995），頁 284-285。

13 小熊英二，《單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頁 218。

14 工藤雅樹，《研究史日本人種論》（東京：吉川弘文館，1979），頁 306-315。

15 江上波夫著、張承志譯，《騎馬民族國家》（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相關論文論述集中於江上波夫的考古調查，如王曉華，〈江上波夫考察阿倫斯木古城隨記〉，《內蒙古文物考古》，7（呼和浩特，1992），頁 130-132。

## 二、從跨學科取徑研究東洋史

江上波夫，東洋史、考古學者，以提出「騎馬民族日本征服說」而著名。他出生於山口縣下關，因父親就業而在東京東京府立第五中等學校、舊制浦和高等學校就讀；1927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東洋史學科，因自小對考古學與古代人類社會有深厚興趣，<sup>16</sup>向專攻中國考古學的原田淑人學習，指導教官為專攻滿洲史、朝鮮史的池內宏教授，畢業論文是《漢代匈奴の文化》。

20世紀初期，第一世代的白鳥庫吉、那珂通世等人開創北亞史研究，隨著日本大陸政策的發展，先後取得臺灣、朝鮮半島、滿洲、蒙古等地域，讓此領域研究成果快速累積。經第二世代的池內宏、<sup>17</sup>

<sup>16</sup> 自高中時期，陸續閱讀盧伯克(John Lubbock, 1834-1913)的 *Pre-historic Times, as Illustrated by Ancient Remains, and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Modern Savages*(漢譯《史前時代》、日譯《史前の時代》)、古朗士(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 1830-1889)的 *The Ancient City*(漢譯《古代城邦》、日譯《古代都市》)、摩爾根(Lewis H. Morgan, 1818-1881)的 *Ancient Society*(漢譯、日譯均為《古代社會》)、梅因(Sir Henry James Sumner Maine, 1822-1888)的 *Ancient Law*(漢譯、日譯均為《古代法》)、泰勒(Sir Edward Burnett Tylor, 1832-1917)的 *Primitive Culture*(漢譯《初民文化》、日譯《原始文化》)。參見江上波夫，《學問と夢と騎馬民族》，頁24。

<sup>17</sup> 池內宏(1878-1952)，東洋史學者，東京都人，祖父池內大學為幕末儒學者。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畢業，1908年受白鳥庫吉招攬進入滿鐵的滿鮮歷史地理研究室，專攻滿洲史、朝鮮史、日本上古史等，其治學風格是先建立假設，再對史料進行嚴密的批判考證。1913年擔任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講師，1916年升任東京大學文科大學助教授，分擔朝鮮史講座。其後，歷任東亞考古學會委員、東方文化學院評議員、理事、日滿文化協會理事等職。其學生有江上波夫、三上次男、旗田巍、青山公亮等，外甥窪德忠為道教研究者，曾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長，次女舒子與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學科教授羽田亨之子羽田明結婚，羽田明之子為羽

羽田亨等人持續經營努力，在各領域取得更多成果。屬於第三世代的江上波夫在自述提到，他深受池內宏建立假說，再以嚴密文獻批判考證求得新說的研究方法啟發；<sup>18</sup>在考古學方面，則受到濱田耕作、原田淑人的影響。<sup>19</sup>

### (一)對考古學、民族學的興趣

江上波夫除了參與歷史學研究會外，還有 APE 會，此會的名稱由來是取三個新興學科的第一個英文字母，分別是 Anthropology(人類學)、Prehistory(史前史)、Ethnology(民族學)。此組織創立於 1925 年，是以岡正雄<sup>20</sup>(民族學)為中心，加上須田昭義(人類學)、江上波夫(東洋史學、

---

田正，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參見窪德忠，〈池內宏〉，收入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頁 82-92。

18 江上波夫提到池內宏的教學方式：當學生們在研究室看到新發現的真興王巡狩碑時，向先生問道：「對於此碑，先生的看法為何呢？」。池內宏：「先考慮 30 分鐘，如果覺得自己看法不適合的話，就將自己到目前為止有關真興王時代的新羅疆域研究全部推翻，加上新的史料，重新建立新說。」參見江上波夫，《學問の探検》，頁 102。

19 江上波夫、佐原真，《騎馬民族は来た!?!来ない!?!—激論江上波夫 vs 佐原真》(東京：小学館，1990)，頁 49。

20 岡正雄(1898-1982)，民族學者，長野縣人，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社會學科畢業。1925 年與柳田國男共同編輯《民族》雜誌，並與江上波夫等人組成 APE 會。1929 年前往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攻讀民族學博士，博士論文為《古日本文化層》，從史前史、考古學、語言學、神話學等多學科取徑論述日本的文化成分。1940 年回國，為設立民族研究所而奔走，該所成立時擔任總務部長。曾任日本民族學協會理事長、國際人類學民俗學聯合會長等，導入上述的多學科研究取徑，對 1940 開始的民族學、文化人類學研究有重要影響。參見大林太良，〈岡正雄〉，今谷明等編《20 世紀の歴史家たち(5)日本編続》，頁 149-160。

考古學)、八幡一郎<sup>21</sup>(史前史)、古野清人<sup>22</sup>(宗教學)等學者。<sup>23</sup>從江上波夫的成長與求學歷程來看,對上述學科都保持相當興趣,他的著作與APE會內的專門領域也都能相互呼應。

他在〈人文科学における考古学の位置〉一文中提到:

與考古學的操作類似的還有民族學與社會學的實態調查,……特別是在民族學被稱為「文化史跡」學派,將民族文化的複合體進行整體性的把握與理解,再將其與其他複合體比較研究,進行文化層、文化圈的設定,……在某文化的年代、地域研究中,考古學、社會學、民族學在方法論上是共通的。總之,考古學是將田野調查視為首要,……民族學、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是有相當多的共通之處,……從方法上來看,上述學問可認為是屬於相同系統。<sup>24</sup>

此段述明考古學與民族學、社會學在研究方法可以共通,而民族學更

21 八幡一郎(1902-1987),考古學者,長野縣人,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大学人類學科畢業,受到鳥居龍藏教導。歷任民族研究所第五部(東南亞、印度、太平洋圈)部長、東京教育大學文學部教授、上智大學文學部教授等。專攻彌生文化、東南亞、東亞、北亞考古學等,著作收於《八幡一郎著作集》。參見蒲原宏行,〈八幡一郎〉,收入西谷正編,《東アジア考古学辞典》(東京:東京堂,2007),頁528。

22 古野清人(1899-1979),宗教學者,福岡縣人,東京帝國大學文学部宗教学科畢業。歷任南滿洲東亞經濟調查局囑託、民族研究所員、九州大學法文学部教授、北九州大學校長、東京都立大學人文學部教授等。專長領域為宗教人類學、宗教社會學,著作收於《古野清人著作集》。參見日本歴史学会編,《日本史研究者辞典》(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頁292。

23 編集部,〈日本民族学会の成立〉,《民族学研究》,29:1(東京,1964),頁58;江上波夫;小堀巖採訪,〈思い出の人びと(6)〉,《學燈》,59:10(東京,1998),頁42-43。

24 江上波夫,〈人文科学における考古学の位置〉,收入人文科学委員会編,《人文特集号(2)人文科学の分類》(東京:文部省,1951),頁19。

重要的作用是整體性把握民族文化複合體，第二步進行比較，第三步是根據共同文化特徵設定文化圈。接著討論上述學科間的相互關係：

歷史學是以文獻記錄為資料，解明人類歷史的學問，……是以政治史為中心，或從社會史、經濟史、思想史、美術史等人類活動進行考察，但將人類發展過程視為整體來把握的嘗試是相對缺乏的。在近期強烈體認到歷史學需把握整體性的重要，……唯物史觀等觀點的出現就是針對上述問題的結果之一。……從把握整體人類史的立場來看，無記錄事物的重要性絕不比有記錄事物來得低。……歷史學僅負責歷史時代，在思考人類發展史很明顯已是時代錯置，無論如何都必需從人類出現開始考察人類發展史。……為了把握人類發展史不可忽視的無文獻記載事物，一方面考古學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是社會人類學與民族學。……接著是考察考古學與社會人類學或民族學的關係。考古學是對整體人類過去的理解，換言之是以闡明人類生成發展的整體樣態為目的之學問，……考古學的遺跡、遺物是偶然遺留，斷片的也很多，完整的相對較少。因此要整體性的把握、理解是困難的，……為了補足考古學的弱點，必需重視社會人類學與民族學。在社會人類學或民族學中，對現在的人類、民族進行實態調查是較有可能，對精神文化、社會構造、經濟等，與物質文化有同樣的理解也是較容易的。故以社會人類學或民族學補充考古學時，就有可能整體性的推定、回復人類的過去。<sup>25</sup>

上述引文闡述歷史學的侷限與民族學等學科的相互關係，考古學也就是史前史，能補充無文獻時期、民族與階級研究的缺乏。考古學加上歷史學能夠對人類歷史有更多理解，但考古學材料殘缺不全，需加上

<sup>25</sup> 江上波夫，〈人文科学における考古学の位置〉，頁 20-22。

社會人類學、民族學對於現代社會、民族的調查，才能對人類史進行推定、復原，最後獲得整體性的理解。

## (二) 1930年代的社會氛圍與學術環境

1930年，江上波夫大學畢業後由東亞考古協會池內宏、原田淑人兩位委員推薦，前往北京留學，在北京大學、輔仁大學、燕京大學等處，修習馬衡的金石學、陳垣的蒙古史、容庚的古銅器研究等課程，也前往長城沿邊地帶實地調查，並開始思考遊牧民與農耕民的互動。<sup>26</sup>

1930年代前後，日本國內的教育是灌輸國家至上主義、天皇至上主義，<sup>27</sup>具體措施有1932年成立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主導強化國民思想教育等事務。1935年右派、軍部等批判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說」，<sup>28</sup>管制力道更加大，使得學界受到噤聲，以天皇萬世一系的「國

<sup>26</sup> 參見江上波夫，《學問と夢と騎馬民族》，頁19-33、37；江上波夫等，〈江上波夫先生を囲んで〉，財団法人東方学会編，《東方學回想VIII學問の思い出(3)》(東京：刀水書房，2000)，頁41；江上波夫，〈江上波夫著作集第七卷月報：幻人夢を語る第七號：農耕民族不死論〉(東京：平凡社，1985)。

<sup>27</sup> 這可追溯自1925年，日本政府為防備無政府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為主發起的左翼運動，制定治安維持法。此法條中首次加入「國體」一詞，此詞的涵義為日本國家憲政體制是遵循天照大神以來至天皇的萬世一系體制，國民也是屬於天照大神的子孫臣民，故認定任何改變國體的活動即為非法，僅政府能擴大解釋。參見家永三郎，《激動七十年の歴史を生きて》(東京：新地書房，1987)，〈學問研究の道をかえりみて〉，頁41-47；日本國體宣揚普及會，《國體の本義》(東京：日本國體宣揚普及會，1936)，頁1-7。

<sup>28</sup> 美濃部達吉(1873-1948)，政治學者，兵庫縣人，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政治學科畢業。其後成為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並擔任比較法制史講座。在其著

體」概念更加堅固而不容動搖。<sup>29</sup>

歷史學界由日本史取得話語權，代表人物是提出「皇國史觀」的平泉澄。<sup>30</sup>此史觀之內涵是以天照大神為歷史起點，將由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之國體視為最高價值，<sup>31</sup>與「國體」概念相互呼應。東洋史、西洋史因無需迎合國體觀念，研究禁忌也較少，所以相對自由。<sup>32</sup>

在上述的背景中，江上波夫於 1931 年完成考察歸國，<sup>33</sup>與三島一、

---

作《憲法講話》(1912)中發表「天皇機關說」，認為天皇是日本的最高統治機關，實際統治權則歸屬於國家法人。參見古川江里子，《美濃部達吉と吉野作造：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を導いた帝大教授》(東京：山川出版社，2011)，頁 1、5-6、44-47、80-85。

- <sup>29</sup> 長谷川亮一，《「皇國史觀」という問題—十五年戦争期における文部省の修史事業と思想統制政策》(東京：白澤社，2008)，頁 70-71。
- <sup>30</sup> 平泉澄(1895-1984)，日本史學者，福井縣人，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國史學科畢業，其後先於東京帝國大學任教職，再前往歐洲遊學時深受克羅齊的歷史精神論(Benedatto Croce, 1866-1952)影響。重要著作有《中世に於ける社寺と社会との關係》。其後陸續擔任史學會常務理事，以「皇國史觀」主導學會運作。弟子有遠山茂樹、色川大吉等。參見三木亘，〈平泉澄〉，今谷明等編《20世紀の歴史家たち(1)日本編上》，頁 159-170；今谷明，〈平泉澄〉，收入尾形勇等編，《歴史学事典 5 歴史家とその作品》，頁 448-449。
- <sup>31</sup> 木村茂光監修、歴史学協議会編，《戦後歴史学用語辞典》(東京：東京堂，2012)，〈皇國史觀〉條，頁 317。
- <sup>32</sup> 家永三郎，《津田左右吉の思想史的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2)，〈第 3 章史学への志向とその思想的立場の形成要因〉，頁 65。
- <sup>33</sup> 1927 年，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池内宏、羽田亨、濱田耕作、原田淑人等人發起組織東亞考古學會，前 4 位為委員，最後兩位為常務委員。自 1928 年開始，實施留學生制度，由常務委員推薦，第一年是駒井和愛，第二年是水野清一，第三年是江上波夫，第四年是田村實造，第五年是三上次男。參見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145800、総委員会関係雑件第一卷(H-3-1-0-1\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江上波夫等，〈江上波夫先生を囲んで〉，頁 41；江上波夫，《学問と夢と騎馬民族》，頁 37。

<sup>34</sup>志田不動磨、松田壽男<sup>35</sup>等 6、7 位青年研究者，因對平泉澄等人的主張不滿，想要自由探討學術研究，所以在史學會之外另成立「庚午會」，希望能更自由、更有批判精神的討論學術。<sup>36</sup>1932 年，此會改名為歷史學研究會；1933 年，發行刊物《歷史學研究》，江上波夫參與並發表論文〈考古学より観たる遊牧民と農耕民——その經濟的發展階段様相試論〉(從考古學看遊牧民與農耕民——試論其經濟發展階段之様相)。

江上波夫歸國後，擔任由外務省資助的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助手，主題名「支那古代北方民族ノ物質的文化」，是其畢業論文「匈奴的文化」的延伸，<sup>37</sup>指導員也是池內宏。<sup>38</sup>上述在《歷史學研究》發表的論文，即是此時的成果之一。

---

34 三島一(1897-1973)，東洋史學者，埼玉縣人，祖父三島中州為二松學社專門學校創辦人，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学東洋史學科畢業，後擔任東洋史學科副手，主要著作有《東亞史概説》。1932 年創立歷史學研究會，並擔任會長。

35 松田壽男(1903-1982)，東洋史學者，東京都人，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学東洋史學科畢業，指導教官為藤田豐八、池內宏，後擔任東洋史學科副手。專攻為北亞史、中亞史、東西交涉史，提倡「乾燥亞洲史」、「中洋史」等觀念，著有《乾燥アジア文化史論》、《漠北と南海》等書，大部分收錄於《松田壽男著作集》(共 6 卷)。參見松田壽男，〈學問と私〉，收入松田壽男博士古稀記念出版委員會編《東西文化交流史》(東京：雄山閣，1975)，頁 435-453；吉田順一，〈小澤重男先生の思い出〉，《日本モンゴル学会紀要》，48(東京，2018)，頁 85-86。

36 三上次男，〈庚午會前後のこと〉，歷史學研究会編《証言 戦後歴史学への道—歴史学研究会創立 80 周年記念—》(東京：歴史学研究会，2012)，頁 70-71。

37 江上波夫，《學問の探検》，頁 171。

38 此計畫期程為 3 年(1931-1934)，後經過展延至 1935 年 9 月，共 4 年。參見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15100、東方文化學院關係條件／東京研究所關係第一卷(H-6-2-0-5\_5\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三)任職與研究

儘管在有志之士的奔走下，學科內與跨學科間的整合與對話持續進行，但政治局勢持續緊縮。1937年，東京帝國大學矢內原忠雄教授因公開發表反戰思想而被迫辭職；1938年，東京帝國大學河合榮次郎教授因發行批判法西斯主義的論著，被禁止販賣該著作，隔年被東京帝國大學處以停職處分。1940年，早稻田大學津田左右吉教授因先前從史料批判的角度研究紀記神話，在《古事記及び日本書紀の研究》、《神代史の研究》、《日本上代史研究》、《上代日本の社会及思想》等書中，提出第15代皇室系譜前均非實際存在之人物，而神話是6世紀的宮人所創造，無史料價值。上述書籍被人所檢舉冒犯皇室尊嚴，使得他被迫辭去教職，並被指控違反出版法，連同出版的岩波書店社長也被以違反出版法起訴。<sup>39</sup>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認為應持續擴張並對佔領地有效統治，故對東亞民族有更多的現地調查與認識。<sup>40</sup>

此時，江上波夫主要在滿洲國進行調查研究，他提到：

從1930到1939年間，日本的不景氣，失業者充滿街道，左翼運動盛行；另一方面，右翼與青年軍人陸續犯下政要人物的暗殺事件，軍部強行侵略亞洲。在此物議騷然的黑暗時期，我屢屢獲得旅行滿蒙的機會。當時的滿洲(現今東北地區)從滿鐵時代末期到滿洲國時代前半，雖是「亞洲風暴」的中心，如同身處颱風眼，卻比想像的更加平靜，……在亞洲的悠閒，如同日本那樣的溫暖

39 家永三郎，《津田左右吉の思想史的研究》，頁378-389。

40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14100977500、公文類聚・第六十六編・昭和十七年・第五ノ四ノ屬三卷・官職一ノ四・官制一ノ四(通則四)(国立公文書館)。

氣氛，讓我能脫離陰鬱的日本，獲得在另一片明朗天地遊玩的心情。<sup>41</sup>

可見其對日本國內高壓氛圍的厭惡，故想要在相對平靜的滿洲國從事研究。1940年12月，以岡正雄、古野清人為首的學者，開始奔走遊說成立民族研究所。<sup>42</sup>1941年，內閣會議決定在文部省轄下設立民族研究所。1942年，文部省在大東亞建設審議會中任命籌備委員，籌備委員有高田保馬、大川周明、羽田亨、和田清、岡正雄、古野清人等，幹事有小林高四郎、江上波夫、八幡一郎、岩村忍等。<sup>43</sup>1943年，文部省成立民族研究所，根據「民族研究所官制」第一條：「民族研究所屬文部大臣管理，為有助於民族政策，進行關於諸民族之調查研究」，<sup>44</sup>設立理由則是「為進行大東亞戰爭，完成大東亞建設，實施相關國策，設置對諸民族進行基礎綜合的調查研究之機關，有其緊急之必要」。<sup>45</sup>其下共有六部，第二部成員共有兩名部員岡正雄

41 江上波夫，〈三宅俊成氏の功績—『東北アジア考古学研究』序文〉，收入江上波夫，《江上波夫著作集12 歴史・人間・旅》（東京：平凡社，1986），頁374。

42 古野清人為民族學會重要人物，同時擔任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高級顧問、制定海軍政策的首腦，與文部省關係也相當良好，在之後民族研究所的用人也有相當發言權。在奔走遊說時，岡正雄與古野清人認為如能獲得首相近衛文磨的同意，設立民族研究所的成功率將會增加，所以兩人先拜訪與首相有師生之情的白鳥庫吉，請白鳥向首相陳情。中生勝美，《近代日本の人類学史：帝国と植民地の記憶》，〈第5章民族研究所：戦時中の日本民族学〉，頁333。

43 〈學界彙報：民族研究所の創設〉，《民族学研究》，8：2（東京，1943），頁273。

44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3022791400、御署名原本・昭和十八年・勅令第二〇号・民族研究所官制(国立公文書館)。

45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14100977500、公文類聚・第六十六編・昭和十七年・第五ノ四ノ属三卷・官職一ノ四・官制一ノ四(通則

(兼任部長)與江上波夫、一名助手德永康元、一名囑託川久保悌郎，<sup>46</sup>調查地域包括美國、西伯利亞、愛斯基摩圈、鄂霍次克與堪察加半島、極北圈、黑龍江流域、滿洲、蒙古、阿爾泰、烏拉爾、斯拉夫圈等 11 處。<sup>47</sup>岡正雄的專業為北方研究，包含西伯利亞至極北圈等處，德永康元為烏拉爾、匈牙利語言學專業，川久保悌郎則是滿洲史研究專業，江上波夫的負責範圍則是蒙古、滿洲等地。<sup>48</sup>

從民族研究所成立到廢止間(1943/01-1945/10)，江上波夫在田野調查、著述以及擔任講座方面都有表現。(參見表 1)值得注意的是，江上波夫與德永康元共同完成的《滿洲国ニ於ケル諸民族ノ概況ト目下重要ナル民族問題》，此書列為「極密」，他是以昭和商社<sup>49</sup>囑託的身分前

---

四)(国立公文書館)。

46 民族研究所下分六部，總務部、第一部(民族理論、政策、教育)、第二部(北部及東部亞洲)、第三部(中部及西南亞洲)、第四部(中國與西藏)、第五部(東南亞、印度、太平洋圈)。參見〈民族研究所々員任命〉，《民族学研究》，新 1：7(東京，1943)，頁 767；中生勝美，《近代日本の人類学史：帝国と植民地の記憶》，〈第 5 章民族研究所：戦時中の日本民族学〉，頁 337。

47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14100977500、公文類聚・第六十六編・昭和十七年・第五ノ四ノ属三卷・官職一ノ四・官制一ノ四(通則四)(国立公文書館)。

48 根據 1942 年 11 月的「民族研究所設置ニ関スル説明資料」，其中的組織及職員配置草案，第二部僅有西伯利亞、蒙古、斯拉夫圈 3 處，當時的預定所員、助手人選則為江上波夫、德永康元，雖有囑託的設置但未有預定人選，對比成立後第二部的 11 處調查地域，應該是隨著補進岡正雄、川久保悌郎而增加。參見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14100977500、公文類聚・第六十六編・昭和十七年・第五ノ四ノ属三卷・官職一ノ四・官制一ノ四(通則四)(国立公文書館)。

49 昭和通商是由三井物産、三菱商事、大倉商事各出資 500 萬円成立的國策會社，表面上的業務是輸出二手武器給第三國，暗中一邊輸出鎗等軍用物資，一邊進行諜報活動與買賣鴉片，是屬於陸軍管轄的極密特務機構，與

往田野調查，過程中參考關東軍、協和會、滿洲國政府的機密文書，關注的是當下的滿洲民族問題，<sup>50</sup>有別於此前的歷史學、考古學論文。他也在機關刊物《民族研究所紀要》發表〈匈奴・フン同族論〉，《民族學研究》發表〈服匿考〉、〈ヤクートの遊牧性とその原住地に関する一考察〉3篇論文，以及相關演講3次。〈匈奴・フン同族論〉使用考古材料論證匈奴與歐洲的匈人是同一民族；〈服匿考〉利用考古學與語言學考證「服匿」為一種液體容器；〈ヤクートの遊牧性とその原住地に関する一考察〉是考察突厥系民族雅庫特的遷徙歷史。

1944年9月，江上波夫自蒙古調查回國，日本戰敗態勢逐漸明朗，政府思考可能會在國內作戰，決定保護青壯學者。1945年5月，江上波夫取得考察許可，與八幡一郎、鈴木二郎、岩村忍、杉浦健一、小野忍等5人於7月自新瀉出發，至中國東北的安東、長春等地，因當地情勢險峻，故八幡等人先行返國。江上波夫則在長春擔任文物返還委員，至1946年11月回到日本。<sup>51</sup>

江上波夫回憶在民族研究所任職期間，認為民族研究所的研究風氣相當自由，所內研究員通常在夜晚時分，聚集在路燈下討論關心的學術問題，待到路燈熄滅時，再回到漆黑的屋內持續討論。江上波夫即是在此環境下，開始關注日本古代文明與東北亞騎馬民族的關係。

52

雖然江上波夫在自傳或接受採訪時，都提到民族研究所學風自由，

---

民族研究所聯繫相當密切。參見中生勝美，《近代日本の人類学史：帝国と植民地の記憶》，〈第5章民族研究所：戦時中の日本民族学〉，頁328。

50 中生勝美，《近代日本の人類学史：帝国と植民地の記憶》，〈第5章・民族研究所：戦時中の日本民族学〉，頁360-361。

51 江上波夫等，〈江上波夫先生を囲んで〉，頁54-55、69。

52 江上波夫，《学問の探検》，頁190-196。

但該機構的成立以及運作，與陸軍、政府關係密切。戰後曾任所長的高田保馬與總務部兼第二部部長岡正雄，都被認定為戰犯而辭去公職，<sup>53</sup>由於江上波夫沒有積極涉入相關事務的決定，而未受牽連。

日本宣布投降後，江上波夫曾做一首〈無條件降伏〉的詩：

抵抗吧，別屈服。再一次無條件降伏的話，再一次成為奴隸的話，再一次成為奴隸的話，地球上無論哪個國家、哪個州、哪個都市也永遠會失去自由。這是 Whitman 的詩句。無條件降伏就是成為奴隸，強迫無條件降伏就是強制陷入奴隸的境遇。高唱著自由的 Whitman 啊。在我的國家裡，我們就被強制無條件投降！在地球上，離實現自由的日子還相當遙遠吧。<sup>54</sup>

呈現他對日本無條件投降而喪失自由的遺憾，與其他東洋史學者、日本史學者對東洋學所帶有殖民性的反省或批判，態度是有區別的。

## 二、滿蒙考古調查的總結——東亞騎馬民族說的提出

### (一) 從民族與文化重構亞洲史

1948 年，江上波夫由野村書店出版《アジア・民族文化の形成》，為「不死鳥文庫」系列叢書中的一冊，<sup>55</sup>從文庫名稱可知，是希望讓

<sup>53</sup> 清水昭俊，〈異人、現在學的民族学、そして種族史の形成—岡正雄と日本民族学の展開—〉，收入ヨーゼフ・クライナー編，《日本民族学の戦前と戦後—岡正雄と日本民族学の草分け—》（東京：東京堂，2013），頁 87。

<sup>54</sup> 江上波夫，〈幻人詩抄〉，收入江上波夫，《江上波夫著作集別卷》（東京：平凡社，1986），頁 17-18。

<sup>55</sup> 野村書店在 1946-1948 年出版的不死鳥文庫系列，與江上波夫的研究較有

日本就像不死鳥重生。從江上波夫的〈序言〉，可窺知他賦予此書的現實意義：

吾等日本人第二鎖國之夢在今次大戰已破滅。吾等現今的命運是與美國、歐洲直接連結。此意義是吾等即為世界一份子。但吾等如果是日本人，也是亞洲人的話，該如何與世界聯繫呢，這就是今後需面對的問題。此問題的核心就是民族與文化。……吾等回溯到亞洲與歐洲連繫在一起的古代，亞洲的民族與文化的形成、接觸、融合、分裂、分化等問題，必需從世界人類史的立場探究。每日思考上述事物，考慮此問題，特別對於東西民族交涉、亞洲文化接觸等問題抱有興趣的筆者，在被東西漩渦卷入的日本局勢下，將筆者腦海中描繪的亞洲民族與文化形成之素描，將此問題的思考公開給大眾。<sup>56</sup>

「不死鳥文庫」叢書的另外九本，多為作者們先前已出版的著作或上課講義、論文的集結，在各自的〈後記〉或〈跋〉中，幾乎都沒有江上波夫上述提及之類似內容，僅有駒井和愛在《日本古代と大陸文化》的〈例言〉提到：「吾等以此理解而能與世界之人相親，其中也能與中國與朝鮮人深結善鄰之好，讓吾國往文化國家而努力。」<sup>57</sup>由此可見江上波夫在〈序言〉提出更多與現實的對話和期待，相信持續研究亞洲能找尋到日本與世界連結的道路。

對照書名《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在日文標點符號中稱為「なかつん」，主要作用為「並列」，可理解書名意思為「亞

---

關連的書籍有：《宗教社会学説》(古野清人)、《原始文化の探求》(古野清人)、《日本古代と大陸文化》(駒井和愛)。

56 江上波夫，《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東京：野村書店，1948)，頁1-2。

57 駒井和愛，《日本古代と大陸文化》(東京：野村書店，1948)，頁2。

洲與文化的形成」與「民族與文化的形成」。對應到〈序言〉，呼應了作者想立足日本，以亞洲的立場來思考文化的形成；更從世界史的立場考察民族與文化。

江上波夫自述提到：

終戰時我在大陸，回到日本已有些晚，到達時看到醫生安田德太郎發表對日本人起源、日本語源流的想法，基本上都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一般人也是同樣看法。但對從戰前到戰後都在大陸生活的我來說，這樣是不行的。至少必須從東亞中的日本來思考此問題。國際關係逐漸世界化，在經濟、文化已不能僅在國家內運作的現代，也是需要科學性說明世界歷史的時代，仍考慮日本中心主義時，其實就是一種皇國史觀。一邊說皇國史觀不好，實際上卻仍保持皇國史觀。這只是在封鎖自身的日本中解決歷史問題，日本史學者就是如此而不自知，而提倡唯物史觀是世界上普遍的歷史理論觀的人也是很奇怪。<sup>58</sup>

由此可見，〈序言〉提到的第二鎖國之夢，應是指日本創造皇國史觀造成的自我封鎖，僅著重天皇萬世一系，無法接受國外地域間的互動。更可惜的是，戰後雖然日本學界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來重建歷史學，但過於熱衷唯物史觀，只以自身考察歷史，忽略地域間互動的現狀，仍是一種皇國史觀。為了要批判這樣的現狀，所以江上波夫呼應〈序言〉所說，要從亞洲的日本，或至少要從東亞的日本來考察。

## (二) 由考古材料建立亞洲諸民族類型

《アジア・民族文化の形成》的貢獻之一，是參考歷來的東洋史

---

<sup>58</sup> 江上波夫，〈騎馬民族說批判にこたえる〉，收入江上波夫，《江上波夫著作集 6 騎馬民族国家》（東京：平凡社，1986），頁 344-345。

研究成果，使用考古材料建立亞洲諸民族的傳統生產類型，提出「農耕民族」、「騎馬遊牧民族」、「狩獵民族」等概念。

「表 2」是江上波夫與此書討論有關的論文與著作，可揭示他在 1934-1967 的學思歷程。所謂不同民族分別由不同的風土帶孕育形成之說(參見表 3)，是先劃分類型，顯示他對亞洲的人類傳統生產方式有整體性的掌握，這是受到東洋史、哲學的影響。東洋史學者提出類似概念的有鳥山喜一、<sup>59</sup>松田壽男，<sup>60</sup>哲學則有和辻哲郎，<sup>61</sup>江上波夫應

<sup>59</sup> 綜觀東洋史著作，自那珂通世開始的通史類著作，亞洲的地理分區是根據地理形勢與諸國政治局勢。1921 年，鳥山喜一提出：「歷史與地理有密切關係。山河或氣候影響民族性，民族性形塑歷史特殊性。事實是漢民族或印度的亞利安族，風土影響其民族性，民族性形塑獨特歷史。……從北緯 23 到 40 度間的平原，受到黃河、揚子江、珠江等大河及無數河川灌溉。此三大河流域的廣大地域，幾乎不存在阻礙人文發展的自然障礙，且其氣候屬於溫帶。……北部地帶的中原住民，都因地理環境而能在政治、風俗、經濟，或甚至文化上能相互融合。……此融合的現象能從北方或從東北來的異民族，一再進入中原，受到漢化，或同化。此就是『地之力』。」筆者認為鳥山喜一所提，不僅指地形，更包含氣候、河川等，這些地理因素形塑民族性，與先前那珂、桑原、藤田等人講述地理僅是為了討論疆土範圍不同，雖無法確認江上波夫與鳥山喜一學說之間的關係，卻與之後江上波夫所提「氣候、地貌、土壤以及相對應的動植物界等因素與人類之間的相互關係」這句話不太容易讀懂，請作者再加潤飾有相似之處。參見那珂通世著，《支那通史》第 1 卷(東京：中央堂，1890)，頁 1-4；桑原鷲藏，《中等東洋史》(東京：大日本圖書，1898)，頁 3-13；藤田豐八，《中等教科東洋史》(東京：文學社，1899)；鳥山喜一，《東洋史觀》(東京：東京室文館，1926)，頁 2-5。

<sup>60</sup> 與江上波夫更有關連的，可能是 1938 年松田壽男提出的說法，他認為：「亞洲大致能分為三個文化地帶，『濕潤文化地帶』、『亞濕潤文化地帶』、『乾燥文化地帶』。首先，來自太平洋與印度洋吹來的風，由亞洲的東方到南方，形成海氣最多的『濕潤文化地帶』，……第二，北極海的風越過西伯利亞北部的凍土，也就是冰土帶，吹向南方，與東南方吹來的太平洋濕風一樣，在亞洲北部的大森林地區形成『亞濕潤文化地帶』。……亞洲

是承襲自松田壽男的三風土帶(濕潤、乾燥、亞濕潤，請參見圖 1)，<sup>62</sup>再發展為五風土帶。五風土帶分別是濕潤、乾燥、亞濕潤、凍土與近東，其

- 的第三個部分是幾乎不受太平洋、印度洋、北極海等外洋影響的地域，是無海氣的乾燥地區，為亞洲的『乾燥文化地帶』。」參見松田壽男，《乾燥アジア文化史論：支那を超えて》(東京：四海書房，1938)，頁 19-21。
- <sup>61</sup> 和辻哲郎認為，需將環境與人文視為一種相互影響的關係，概括此種關係的詞彙就是「風土」，在理解人時，需同時關注風土與歷史，且風土具有歷史性。風土則可分為三種：季風型、沙漠型、牧場型。筆者認為相較於鳥山喜一對於歷史的理解而提出的概念，和辻哲郎則是更關注於人。風土的分類也有所差異，與江上波夫相比，目前也尚未看到有直接連結的證據。參見和辻哲郎，《風土》(東京：岩波書店，1973)，頁 7-23；和辻哲郎著，陳力衛譯，《風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頁 5-12。
- <sup>62</sup> 松田壽男提到：「我們一邊研究中亞史與西亞史，也就是乾燥亞洲史，一邊對舊的東洋史，也就是中國史，也可稱為漢文亞洲史的現狀感覺奇特。我們經常討論真正的亞洲史，由我們提倡的亞洲史構圖絕非新提出之物。贊成此構想計畫的有野原四郎，接著有從物質文化史角度暗示此構想，更支持此構想的江上波夫協助。」在 1937 年由四海書房出版「アジア史叢書」即為此計畫成果，其中松田壽男撰寫《アジア史總論》、志田不動磨撰寫《アジア精神文化史》、江上波夫撰寫《アジア物質文化史》，可知松田壽男想要喚起學界對乾燥亞洲的研究不足，但是目前尚未在任何圖書館看到此套叢書。值得注意的是，江上波夫也認為須提倡乾燥亞洲研究，可見對於三分文化地帶是已知且贊同的。松田壽男在 1942 年出版的《漠北と南海—アジア史における沙漠と海洋》對亞洲風土有更詳細的闡述：「筆者認為『認識亞洲』的基礎不能僅是依靠地理知識。與歷史認識一起，加深其認識是絕對必要的。也就是說，亞洲必需要從『史地學』的取徑來把握。」此處所提的史地學，並非是新學科，是來自日本的「風土記」記述的概念，將地理視為理解的基礎，再將歷史放在地理脈絡上考慮。參見松田壽男，《乾燥アジア文化史論：支那を超えて》，頁 9-14、24；松田壽男，《漠北と南海—アジア史における沙漠と海洋》(東京：四海書房，1942)，頁 10；松田壽男，《アジアの歴史—東西交渉からみた前近代の世界像》(原刊 1971)，收入日比野丈夫等編，《松田壽男著作集 5 アジアの歴史》(東京：六興出版，1987)，頁 21。

中凍土不適宜人居，文中僅有〈序說〉提及，近東地帶是農耕發源地、文化起源地，所以凍土與近東可略過。重點是濕潤、亞濕潤、乾燥三個地帶，分別經營農耕、遊牧、狩獵，在三者之間又有半農半牧、半農耕半狩獵、半遊牧半狩獵。<sup>63</sup>

他先考察游牧民的「蒙古細石器文化」，論述歐亞大陸內游牧民「打製石器」與農耕民「磨製石器」的差別，進而帶出起源於西亞地區的原始民族因自然環境而逐漸分化為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sup>64</sup>接著在農牧交錯地帶發現此地域人群同時具有農耕民與游牧民特徵，也是使用弓矢為主的騎兵，此民族在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間，既掠奪農耕民族，也是商業的中介者，同時也鑄造青銅器供給游牧民族使用。<sup>65</sup>(表2的編號1、2)

### (三) 亞洲諸民族的歷史與互動規律

承續〈序說〉中民族與風土帶的設定，章節如下：

- 一、序說
- 二、亞洲濕潤地帶中農耕民族的出現
- 三、亞洲乾燥地帶中原始游牧民與騎馬民族的出現，並論中間山岳地帶半農半牧民的出現
- 四、亞洲亞濕潤地帶中狩獵民與其周邊半狩獵半農耕民、半狩獵半游牧的出現

63 江上波夫，《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頁9-14。

64 江上波夫，〈考古学より観たる游牧民と農耕民—その經濟的發展階段様相試論〉，《歴史學研究》，1：6(東京，1934)，頁410-411。

65 江上波夫、水野清一，《內蒙古・長城地帶》(東京：東亞考古學會，1935)，頁55-56、203-205。

### 五、東亞濕潤地帶農耕民族的發展與東亞文化圈的成立

### 六、結語

作者先簡述近東、印度、東南亞等濕潤地帶的農耕民族概況，再詳論中國農耕文明發展：

從新石器時代生活於黃河流域的農耕民在經濟、社會、文化上逐漸發展，經歷過都市國家、封建制國家的階段，在西元前三世紀建立了東亞最古老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秦帝國。……具有當時最高度文化的華夏民族(中國民族)在古代東亞出現了。一方面，從春秋時代到秦統一的五百年間，華夏民族的興起大大左右了東亞的命運，更像東亞其他濕潤地域傳播農耕文化或直接殖民，……另一方面，東亞的乾燥地帶也出現遊牧民族(騎馬民族)，兩者展開激烈鬥爭的同時，也通過鬥爭進行文化互動。<sup>66</sup>

華夏民族建立的農耕文明成為東亞代表文明，與遊牧民族互動。遊牧民族雖遍布乾燥地帶，卻尚未形成足以抗衡華夏民族的勢力，促使遊牧民轉變為騎馬民族的關鍵是半農半牧民：

必需注意亞洲乾燥地帶與濕潤地帶接觸的東方與西方的山岳臺地地帶(在地景上位於兩者之間)，居於純農牧民與純遊牧民間，維持半農半牧生活的住民。……也就是貉、狄、犬戎等民族，是與黃河流域的華夏民族同樣的人種，卻構成截然不同之民族，以今日的長城地帶南邊為界，兩者激烈對抗。此為東亞民族史上最顯著的現象之一的南北對抗戰。<sup>67</sup>

新石器時代半農半牧民多是農業為主，遊牧為輔，至青銅器時代以牧主農輔的住民為主。他們逐漸發展壯大，開始與南方農耕民頻繁接觸，

---

<sup>66</sup> 江上波夫，《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頁 41-42。

<sup>67</sup> 江上波夫，《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頁 51-52、57。

進而了解南方的富庶，即為春秋時期北方的貉、狄、犬戎等民族，與華夏民族對抗，形成東亞民族史上最初的南北對抗。<sup>68</sup>戰國時期，遊牧民自戎狄習得騎射技術，再學習從西方斯基泰人傳入的鑄銅技術，使得武裝力量加強，轉變為騎馬民，(參見表 4)南下侵略華夏民族，東亞民族史進入真正的南北對抗階段。<sup>69</sup>

接著是亞濕潤地帶的狩獵民、半狩獵半農耕民、半狩獵半遊牧民如何被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影響。純狩獵民的生活平穩，直至 17 世紀才有變化。原以狩獵為主，後受農耕文化影響而在戰國至漢代時期成為半狩獵半農耕民，以高句麗為代表。半狩獵半遊牧民受到遊牧文化影響較深，如突厥。<sup>70</sup>(參見表 4)

從上述內容來看，筆者認為江上波夫貫穿全書的概念有二，一為南北對抗論，另一為騎馬遊牧民。南北對抗在全書經常出現，<sup>71</sup>此概念是由白鳥庫吉所提：

今日所謂貫穿東洋史的大勢，其根本就是我們近年所提倡南北兩大勢力對立的事實。大體上意即以漢民族為代表的南方勢力，與以北狄為名概稱的北方勢力，兩勢力的一興一廢、一張一弛，還有以此為中心發展的附屬勢力的離合與集散，成為東洋史發展的樞軸。直到近代，如英人做為南方勢力而出現，俄人做為北方勢力而活躍，也依然為此一形勢的存續，遠東歷史以此兩因素之對立為基礎發展就是我們的主張。<sup>72</sup>

68 江上波夫，《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頁 55-57。

69 江上波夫，《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頁 73-78。

70 江上波夫，《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頁 118。

71 關於南北對抗的論述共出現 7 次。參見江上波夫，《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頁 41-42、57、68、72-73、82、102。

72 白鳥庫吉，〈東洋史に於ける南北の對立〉，收入白鳥庫吉，《白鳥庫吉全集第八卷アジア史論上》(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 69。

江上波夫承繼此論點，在此書中有類似論述：

無論如何，在南方濕潤地帶各地的農耕民族各自形成統一大型國家時，北方乾燥地帶原始遊牧民，不問其出身，全部轉化為騎馬民族，農耕諸民族對騎馬諸民族，也就是樹立起南北對抗的大勢。此形勢至近世仍大致持續。<sup>73</sup>

從上述可見，江上波夫延續白鳥庫吉對東洋史的設定框架，將白鳥庫吉的遊牧民概念更加細緻化，強調其受到歐亞大陸西方斯基泰文化影響而轉變為騎馬遊牧民。值得注意的是，江上波夫將南北對抗概念延伸到歐亞大陸(文中用詞為「舊大陸」)，在西亞、東歐、印度等地域，雅利安人可歸類為中間山岳地帶的半農半牧民，有相同歷史構造。<sup>74</sup>之後再進一步將兩區域的歷史連結，他認為西亞的雅利安族、東亞華夏民族與北方塞外民族的互動，成為東亞民族興亡與東西文化交流的基礎。<sup>75</sup>第二，在原有的遊牧民外，增加狩獵民、半農半牧民、半狩獵半農耕民、半狩獵半遊牧民的類型，再將這些類型歸於騎馬遊牧民族之下。在此概念提出之前，論述東洋史時多是以歷史上各民族名稱具體稱之，如蒙古、女真、突厥等塞外民族；此概念提出後，在論述東洋史、北亞史時的主體民族就是騎馬遊牧民。

#### (四) 東亞史視野下的日本

最後，江上波夫把焦點放在東亞文化圈的成立與發展。秦漢時期，華夏民族將農耕文明擴散到高句麗、南朝鮮、西日本、印度半島等地，這些地域吸收後都陸續自主獨立，發展各民族的勢力圈。魏晉南北朝

---

73 江上波夫，《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頁 102。

74 江上波夫，《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頁 60-71。

75 江上波夫，《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頁 71。

時期，華夏民族衰弱時，中間山岳地帶的騎馬遊牧民——烏桓與鮮卑興起，特別是鮮卑建立的拓跋魏王朝，是首次建立的戎狄大帝國。<sup>76</sup>

其中南朝鮮與西日本的考古遺存，可發現所呈現的金屬文化不僅是經由南滿洲傳來的純華夏文化，也有經由東蒙古、滿洲、北朝鮮傳來的匈奴、東胡青銅器文化，還有來自華中、華南或印度半島的金屬文化，具體呈現在當時以博多為中心的北九州文化圈(來自華中、華南或印度半島的金屬文化)與以瀨戶內海、畿內為中心的文化圈(來自東蒙古、滿洲、北朝鮮傳來的匈奴、東胡青銅器文化)。<sup>77</sup>因此，日本考古遺存來自北亞、東北亞的騎馬遊牧民族，華中、華南、印度、馬來半島的農耕民族，形塑日本古代文化。

隋唐時，華夏民族完善東亞文化圈，周邊民族受其影響，日本創出天平文化，新羅、渤海也迎來文化極盛期。究其原因，主要是有北朝傳統的唐朝對其他民族的影響力與包容性，也沖淡了先前濃厚的華夏色彩，特別是對中亞民族文化的吸納，奠定東亞文化圈的多元基礎。

78

由此可知，江上波夫以考古學、民族學方法劃定文化圈，再根據歷史事實進行推論與建立假說，是承襲池內宏的研究方法，而用以解釋的是白鳥庫吉提倡的南北對抗論，建構亞洲民族與文化互動的新史觀。

---

76 江上波夫，《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頁 137-149。

77 江上波夫，《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頁 150-151。

78 江上波夫，《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頁 171-181。

### 三、從東亞史到日本史——近東考古調查與騎馬民族說的擴大、完善

#### (一)引起熱潮的「日本民族文化源流與日本國家形成」座談會

自 1930 年代後期以來，越來越緊縮的社會氛圍，「第二次鎖國」的皇國史觀，讓學界越顯沈寂。可惜的是，儘管戰後日本史學界已在反省戰爭責任，使用唯物史觀研究歷史蔚為風潮，但在江上波夫來看，封閉式使用唯物史，觀無疑是另一形式的皇國史觀。因此他要提出新見解來刺激學界，<sup>79</sup>所以在《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的附記提到：「我最近對日本民族國家成立有新思考，認為有充分研究的必要。」<sup>80</sup>可見已對此課題有較多思考。

1948 年 8 月，江上波夫與岡正雄、八幡一郎、石田英一郎舉辦座談會，主題是「日本民族文化源流與日本國家形成」，可說是江上波夫提出「騎馬民族日本征服說」的第一篇學術記錄，在學界引起強烈的迴響與討論。<sup>81</sup>

岡正雄在座談會中提到：

---

79 江上波夫，〈騎馬民族說批判にこたえる〉，收入江上波夫，《江上波夫著作集 6 騎馬民族国家》，頁 344-345。

80 江上波夫，《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頁 168。

81 柳田國男、折口信夫對談，石田英一郎司會，〈日本人の神と靈魂の觀念そのほか〉，《民族學研究》，14：2(東京，1949)，頁 87；柳田國男、折口信夫對談，石田英一郎司會，〈民俗學から民族學へ—日本民俗學の足跡を顧みて—〉，《民族學研究》，14：3(東京，1950)，頁 173-190；〈國家起源に示す熱意江上波夫著《騎馬民族国家》〉，《朝日新聞》，1967 年 1 月 16 日，第 12 版。

皇室的種族與文化雖無法一言斷定，但與南滿古代國家的夫餘或高句麗在文化上——或是種族上——有很近的關係，他們是帶有牧民意識形態，也有農業、狩獵的多面向種族。<sup>82</sup>

其後，八幡一郎從比較繩文文化後期與古墳文化初期的考古材料，提出北亞騎馬文化的影響。在民族學對神話、傳說的考察，以及考古學對日本與大陸文化的考察基礎上，江上波夫從史料切入，綜合前兩者的觀點：

東洋史幾乎默然不提此事，或未有直接解答。但從四到五世紀期間東亞有顯著現象，即為亞洲大陸北方系的騎馬民族陸續南下，於農耕地帶定居建國，形成統治階層，如北中國由五胡所建立的十六國，或是由鮮卑建立的北朝，在朝鮮則促成高句麗、百濟並立。因此，從當時東亞大勢來看，南下朝鮮的夫餘或濊即為亞洲大陸北方系騎馬民族的其中一支，渡海到日本，使用騎馬而卓越的武力征服倭人，成為統治者，這並非不可思議。創建大和朝廷的天皇氏等族曾統治弁韓，以此為中介從亞洲大陸到日本列島，……以天皇氏為中心，聯合大伴、物部、蘇我諸氏進入近畿，……此形成一種軍事性氏族聯合體，作為領袖的天皇是由從天皇氏族的有力者中選出，天皇氏勢力逐漸壓倒其他氏族，獨佔統領之位，成為世襲，確立了天皇氏的大和王朝。<sup>83</sup>

有北亞淵源的騎馬遊牧民族，在 4 至 5 世紀初期，先在朝鮮半島建立弁韓等政權，再渡海南下。這個騎馬遊牧民族是以天皇氏族為中

---

82 岡正雄、八幡一郎、江上波夫對談，石田英一郎司會，〈日本民族文化の源流と日本國家の形成—對談と討論〉，《民族學研究》，13：3(東京，1949)，頁 229。

83 岡正雄、八幡一郎、江上波夫對談，石田英一郎司會，〈日本民族文化の源流と日本國家の形成——對談と討論〉，頁 241-243。

心，結合其他氏族的軍事氏族聯合體，最後成功建立了大和王朝。大和王朝的統治方式與鮮卑、契丹、蒙古、女真一脈相通。至此，江上波夫較為完整的提出「騎馬民族日本征服說」及其論據。關於騎馬遊牧民族建立的政權概念：

至應神、仁德天皇時，大和朝廷的權力已相當強盛，數倍於金字塔的兩天皇陵寢，此種大陸式的大型土木事業，就是征服王朝對被征服之倭人、毛人徹底性統治的紀念碑。能預期征服日本與統治朝鮮半島，跨越兩者建立倭國的大和朝廷，的確是騎馬民族，也是征服王朝，其統治方式更與鮮卑、契丹、蒙古或女真、滿洲等征服王朝一脈相通。<sup>84</sup>

江上波夫認為大和朝廷與鮮卑、契丹、蒙古、女真、滿洲等建立的政權一脈相通，都是征服王朝。

## (二)從滿蒙到近東(1951-1967)——世界史的構想

自 1951 年起，江上波夫開始頻繁地出席國際會議，並受邀前往近東參與考古挖掘，以及至歐美大學講學；更重要的是擔任東京大學伊拉克·伊朗遺跡調查團團長，共負責五次(1956、1957、1959、1960、1964)調查行動。<sup>85</sup>1967 年 3 月，江上波夫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退休，

84 岡正雄、八幡一郎、江上波夫對談，石田英一郎司會，〈日本民族文化の源流と日本國家の形成——對談と討論〉，頁 47。

85 江上波夫踏入歐美學界的契機，是 1949 年法國蒙古史學者格魯塞(René Grousset, 1885-1952)至日本訪問，特別要求拜訪江上波夫，觀看他在 1935 年內蒙古奧隆·蘇梅(Olon Süme)景教教會遺跡收集的相關資料。由於這是東亞最早的教會遺址，江上波夫以此開始受邀至歐美大學講學、參與國際會議與近東考古調查。參見江上波夫等，〈江上波夫教授主要著作目錄〉，財團法人東方學會編，《東方學回想VIII學問の思い出(3)》，頁 60、69-70；

在此之前，近東考古調查是此時期的研究主軸；同年 11 月，出版《騎馬民族国家》。

從江上波夫年譜來看，可發現他自 1949 年到 1991 年間，不曾踏足滿洲、內蒙古，而是將研究重心放在近東考古，看似已擱下騎馬民族說，但他是在近東考古時持續考察騎馬民族、東亞文明、日本文明等議題，試圖將這些議題與世界史連結。<sup>86</sup>江上波夫提到：

從我的立場來說，世界史是創出都市文明的農耕民族與以經營牧畜或是狩獵為主的騎馬民族，從兩者的對立、抗爭、接觸、共存關係發展形成。……我希望從騎馬民族重新看待世界史時，對應到亞洲，特別是東亞，再建構新的世界史。目前世界史是十九世紀後半西歐統治世界時建構的西歐中心史觀，將希臘、羅馬視為世界文明起源時代的產物。這樣的史觀是無視或過小評價世界史中的古代近東、北方歐亞的騎馬民族，中世中國、阿拉伯、日耳曼等的作用，是不配稱為「世界史」。……如果只將希臘、羅馬視為歐洲世界唯一文明來建構歷史，那麼為何日耳曼不知不覺已創出與其不同的文明，並在文化、軍事壓制地中海世界，……所以如忽略北方歐亞騎馬民族的存在及其歷史作用，也是同樣不能建構中國史、東北亞史、日本史。<sup>87</sup>

這是將原本適用於東亞史的南北對抗論延伸到世界史，並考察騎馬民族在各地建立征服王朝的歷史，農耕文明如何吸收這些騎馬民族的文

江上波夫，《學問の探検》，頁 230-231。

86 江上波夫等，〈江上波夫教授主要著作目錄〉，財団法人東方学会編，《東方學回想VIII學問の思い出(3)》，頁 60、69-70。

87 江上波夫，〈騎馬民族と世界史〉，收入江上波夫，《江上波夫著作集6 騎馬民族国家》，頁 370、378、381。

化。<sup>88</sup>他也藉由考察近東農耕、牧畜的起源，思考東亞文明、日本文明的源流。<sup>89</sup>除了帶領近東考古團外，也參與上智大學泰國西北歷史文化調查團、日蒙共同學術調查團等，可說是廣泛的在世界各地考察人類文化起源問題。<sup>90</sup>

筆者認為，在 1948 年的座談會後，儘管基本架構已成，但江上波夫仍然在對近東、泰國北部、蒙古等地進行考古發掘時，從材料與方法完善此說，也可說是從世界史視角完善「騎馬民族征服王朝」說，直至 1967 年東大退休後出版《騎馬民族国家》。

### (三)「騎馬民族日本征服說」的完善

相較於座談會的論述，江上波夫在《騎馬民族国家》的〈緒言〉提出更完整的研究方法論：

歷史學者的任務是進行歷史的復原，這是最基本而不可避免的問題。但考慮到相當困難，可由歷史學者進行的大致上有三取徑或三階段研究法。第一或是第一階段的研究法是史料的部分復原。歷史就是過去，只有留下片段的史料。盡可能大量搜尋史料，正確拼接，成為更大片史料。……第二或是第二階段的研究法，是比較研究或分類研究。將史料相互比較，設定相互關係與定位，進行整體像的假設。……第三是統整總合的研究，即使進行歷史的假設復原，仍然是假設，需要將問題從其他面向，使用其他資

88 江上波夫，《學問と夢と騎馬民族》，頁 211。

89 江上波夫，《學問の探検》，頁 242-248。

90 江上波夫等，〈江上波夫先生を囲んで〉，財団法人東方学会編，《東方學回想VIII 學問の思い出(3)》，頁 59。

料，反覆進行假設復原，直到其結果無矛盾，進行組合，才是真正復原歷史。<sup>91</sup>

第一階段的研究法是包含考古材料與史料的操作，「正確拚接」指的是校對材料，確立材料間的關係，此為受到池內宏與考古學研究法的影響。第二階段的研究法是第一階段的延伸，差異在於以比較研究建立「整體像」，是受到民族學研究方法的影響。第三階段是「總合」的跨學科研究，是受到前述 APE 會的影響，主要是民族學、社會人類學、考古學、歷史學等領域的相互探討。可見江上波夫在座談會後的近東考古工作中，也不斷思考如何完善研究方法與論述。<sup>92</sup>

正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講述北亞遊牧民的所處環境與政治、文化傳統(參見圖 2)。其中的地理環境與騎馬民族概念源自於《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sup>93</sup>也是江上波夫第一、第二階段的研究成果，提出亞洲民族各類型。接著選擇斯基泰、匈奴、突厥、烏桓、鮮卑，論述各自的墓葬型制、宗教與薩滿觀念、政治軍事體制、統治農耕地帶政策等。作者先介紹第一個歐亞騎馬遊牧民族——斯基泰，延伸到東亞第一個騎馬遊牧民——匈奴，匈奴受到斯基泰的強烈影響。第三個突厥是東亞史中世的代表半狩獵半遊牧民族，第四個是山岳地帶半農半牧民族——烏桓與鮮卑，他們興起於東北亞，與日本古代民族有

91 江上波夫，《騎馬民族国家》(東京：中央公論社，1967)，頁iii-v。

92 江上波夫提到：「我在提出時的論述是未完成的。歷史也因為是未完成，隨著資料或是研究方法逐漸成熟而完善。所以一開始提出的論述是無法相信的。」江上波夫等，〈江上波夫先生を囲んで〉，財団法人東方学会編，《東方学回想VIII学問の思い出(3)》，頁59-60。

93 江上波夫在《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提出五個氣候帶及其對應的民族：濕潤地帶—農耕民族、乾燥地帶—遊牧民、亞濕潤地帶—狩獵農耕民、Orient地帶—農耕民、遊牧民、商業民、凍土地帶—無。《騎馬民族国家》則刪除凍土地帶，提出四個氣候帶，而Orient地帶改為西南亞地帶。

密切的互動。

筆者認為第一部分的安排，顯示作者要將日本的文化與歐亞騎馬遊牧民族的文化進行系譜上的連結，介紹每個風土帶的代表民族類型，使其能與日本古代文化進行比較。

第二部分是「日本的征服王朝」，<sup>94</sup>又分為「日本國家起源與征服王朝」、「日本統一國家與大陸騎馬民族」、「日本民族的形成」三章。第一章的論述大致出自 1948 年座談會內容，包含對考古遺存、神話、騎馬民族征服日本，可參考前述，此不再贅言。比對其研究方法，第一章屬於史料拼接與提出假說，屬於第一階段。第二章是屬於第二階段的比較研究，探討日本大和王朝與大陸騎馬民族征服王朝在統治的二元性、繼承制度、即位儀禮等比較。<sup>95</sup>(參見表 5)從這些比較，可看到兩者有極高的相似性。

第三章是探討日本民族的形成，江上波夫先提出繩文時代的狩獵文化到彌生時代的水稻農業文化是非自然演變，是由外來力量強制改變。此外來力量傳播稻作文化，有可能是華北或華中至華南，但前者當時應非稻米文化圈，所以有可能是後者。另一個值得注目的，是古

<sup>94</sup> 「征服王朝」為借用 K. A. Wittfogel 的「Dynasty of Conquest」。參見江上波夫、佐原真《騎馬民族は来た!?!来ない!?!—激論江上波夫 vs 佐原真》，頁 22、34。

<sup>95</sup> 1949 年江上波夫提出「騎馬民族日本征服說」，護雅夫在 1967 年 6 月出版《遊牧騎馬民族国家》，江上波夫在 1967 年 11 月出版《騎馬民族国家》。護雅夫是受到江上波夫的影響而撰寫，論述北亞騎馬遊牧民族的神話傳說、即位儀禮、祭儀，不涉及與日本天皇的比較研究。他提到：「在撰寫此書時，我的腦海就出現天皇而揮之不去。但是對我而言，這不是突發奇想。此書是以北亞遊牧民族為中心，不直接討論日本天皇。我還是希望讀者能理解，北亞遊牧君主與日本天皇的這組對比，並非如一般認知這般突發奇想。」由此可見，護雅夫也是贊成江上波夫的看法。參見護雅夫，《遊牧騎馬民族国家》(東京：講談社，1967)，頁 6。

墳時代前期與後期的巨大差別，也是外來力量強制改變，即為前述的東北亞騎馬遊牧民，他們經內蒙古、南滿洲、朝鮮半島而來。兩種文化相互形塑而成日本文化。

從座談會到此書出版後，以至於 20 世紀末的數十餘年間，引起日本史(水野祐、井上光貞、藤間生大、石母田正、小倉慈司)、人類學(金關丈夫、石田英一郎、中根千枝)、考古學(森浩一、直良信夫、後藤守一、小林行雄、齋藤忠、佐原真)、民俗學(柳田國男、折口信夫)等領域學者提出質疑，為當時熱議的論爭。<sup>96</sup>例如：考古學者從前後期古墳文化的關係、馬具、騎馬戰、牧畜去勢等多面向提出反論，小林行雄認為前後期古墳文化並未如江上所言有明顯斷裂，而是有明顯的連續性；馬具的國產化與騎馬的普遍化是在 5 世紀末後，並非如江上所說的 4 世紀後半到 5 世紀間。<sup>97</sup>佐原真認為日本的馬、羊的雄性去勢，直至近代都未見到騎馬民族的關聯特徵。日本史者的反應，可以石母田正為代表，他提到：「戰後提出的新學說『騎馬民族說』大家可能都知道，……因此不能說這是完全無根據的假說，這是有所據。……我雖然不贊成此結論，但是如此從大陸——朝鮮半島——日本，在相當廣闊的地域中思考日本國家的成立，宏大的構想是騎馬民族說的特徵之一。……其根據雖然我也反對，也能提出若干證據。可提出如此大膽假說，對學問的進步相當重要，不必冷眼相待，但要接受此說，我是否定的。」<sup>98</sup>另一位日本史學

96 對於論爭的總結性對談集與論文集，可參見江上波夫等著、鈴木武樹編，《論集騎馬民族征服王朝說》(東京：大和書房，1975)；江上波夫、森浩一，《騎馬民族說：對論》(東京：徳間書店，1982)；江上波夫、佐原真，《騎馬民族は来た!?!?来ない!?!?——激論江上波夫 vs 佐原真》。

97 小林行雄，〈上代日本における乗馬の風習〉，《史林》，34：3(京都，1951)，頁 173-190；佐原真，《騎馬民族は来なかつた》，頁 220。

98 石母田正，〈VI 日本國家の成立〉，收入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四卷》(東京：岩波書店，1989)，頁 177-179。

者井上光貞也肯定提出宏大假說，能推動學問進步。<sup>99</sup>民俗學者柳田國男、折口信夫則認為能據以反思民俗學的方法，但細部仍有許多問題未解決，如騎馬民族如何渡海、騎馬民族與農耕米文化的關係等，所以無法贊同此說。<sup>100</sup>江上波夫不斷的完善騎馬民族說，以回應上述疑問，並期待跨學科的綜合討論。<sup>101</sup>而考古學家佐原真的見解可以作為這場論爭的結論：「騎馬民族日本征服說」是在戰後恢復言論自由的背景下興起，推翻萬世一系的日本史，儘管受到不同學科的批判，但為市民階層接納的「假說」。<sup>102</sup>

## 四、從東亞史到歐亞史——以「騎馬遊牧民族」解釋世界史

### (一)從東亞史到歐亞史

從《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到《騎馬民族国家》，江上波夫對歷史解釋的範圍從東亞、亞洲、日本，再到世界史，代表了江上波夫的學術企圖。在《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中，我們可以看到「東亞」使用最多，其次是「アジア」，「東洋」僅出現一次。書中提到：「此即東亞民族史上最顯著現象之一的南北對抗

<sup>99</sup> 井上光貞，《古代史研究の世界》（東京：吉川弘文館，1984），頁 56-58。

<sup>100</sup> 柳田國男、折口信夫對談，石田英一郎司會，〈日本人の神と靈魂の觀念 そのほか〉，頁 89-90。

<sup>101</sup> 江上波夫、佐原真，《騎馬民族は来た!?来ない!?—激論 江上波夫 vs 佐原真》，頁 36-37。

<sup>102</sup> 佐原真，《騎馬民族は来なかった》（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93），頁 218-220。

戰的序幕」，<sup>103</sup>此說法是源自於白鳥庫吉的東洋史的南北對抗論。另一個論述是：「事實上華夏民族與其北方塞外民族及中亞以西雅利安系民族的三角關係，成為橫貫其後三千年之東亞諸民族興亡、東西文化交流的基礎」。<sup>104</sup>由此來看，江上波夫還是延續戰前的東洋史架構來論述戰後的東亞史，但已不太用「東洋史」一詞。另一個論述是「以亞洲為舞台華麗展開的南北抗爭，就開始『亞洲風暴』」，<sup>105</sup>是以伊朗、兩河流域所處的「西亞」，<sup>106</sup>也存在著南北抗爭，將整個亞洲都納入他的解釋範疇中。在《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論述騎馬遊牧民，會使用「ユウラシア」，<sup>107</sup>就是「eurasia」，現在的假名改為「ユーラシア」。《騎馬民族国家》多數使用的名詞是「アジア」、「ユーラシア」，而「ユーラシア」則會再加上內陸或北方，成為「內陸ユーラシア」與「北方ユーラシア」，強調騎馬遊牧民族的棲息地域，而此地域橫跨歐亞大陸，能延伸運用到世界史範疇。

從上述的變化，可看到江上波夫學術關懷的兩個方向，一是藉由北亞研究連結到日本史，具體成果就是「騎馬民族日本征服說」；另一則是藉由騎馬遊牧民將對亞洲大陸的觀察，擴散到世界史的範疇。這正好呼應了《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的〈序言〉提到日本如何連結到世界，而對騎馬遊牧民族的研究，就是江上波夫提出的研究取徑。

## (二) 騎馬遊牧民族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

103 江上波夫，《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頁 57。

104 江上波夫，《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頁 71。

105 江上波夫，《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頁 82。

106 江上波夫，《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頁 75-78。

107 江上波夫，《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頁 81-82、111、137。

江上波夫提到：

一直以來，在思考我是怎麼樣的人，與此同時，該如何從歷史觀察自身的過去。感覺到自身之中共存著農耕民族與騎馬民族的部分。原本確信自己是農耕民族式的人，困在自身的殼中，是個性封閉的人。……但是，實際上在不知大學能否畢業時，就成為東亞考古學會的補助留學生，持續從長城地帶到內蒙古進行調查旅行。我的想法大幅變化。這是我的命運，更可說是天命，像農耕民一樣甘心忍受。如此，漸漸成為農耕民族般的命運論者。在迎來古稀之前時，我感受到本身就有著騎馬民族的部分。這不只是我，在多數日本人中，並存著農耕民族的部分與騎馬民族的部分，或是重疊共存。<sup>108</sup>

江上波夫回顧本身研究時發現，自身甚至是多數日本人應該都有農耕民族與騎馬民族的特質。藉由對農耕民與遊牧民的比較研究，在不斷思索日本人的起源與性格時，更思考亞洲諸民族以至於世界史的文化形成。這是江上波夫在戰敗後重新反思自身而提出，蘊含世界史中「騎馬遊牧民族」的重要性，此概念從貫穿東亞史到日本史，最後到世界史。柳田國男更提到：「最開心的是得知白鳥老師以後的研究，由江上君等人持續發展。」<sup>109</sup>這也可理解為在白鳥庫吉提出東洋史上的南北對抗論後，池內宏著重於滿鮮史考證，羽田亨著重於滿蒙史、中亞史與解讀非漢文史料，而江上波夫則以「騎馬民族論」推進了北亞史的內涵。

他更進一步說明騎馬民族意識形態之基礎是「知識」，他們在情報

---

108 江上波夫，〈江上波書著作集第十卷月報：幻人夢を語る第六號：自画像——私の中の農耕民族と騎馬民族〉（東京：平凡社，1985）。

109 柳田國男、折口信夫對談，石田英一郎司會，〈日本人の神と靈魂の觀念そのほか〉，頁 87。

中生存，「知識」是本身與他人結合的唯一紐帶。以家畜為夥伴，過著孤獨的遊牧生活的他們是自由卻無力。將他們連繫起來的是遊牧社會，但與聚落、都市的社會不同，只能在彼此共享情報與知識有存在感。其社會用現今的話就是「情報社會」，這是現代社會的基礎之一，<sup>110</sup>以此說明騎馬遊牧民族的影響不只是世界性，時間上也跨越過去到現今。

## 五、結語

東洋史是日本為了實現防衛西洋力量而創造出來的學問，<sup>111</sup>有強烈地將西洋設定為競爭對手的想法；東洋史原本的核心是中國史，隨著白鳥庫吉沿著朝鮮、滿洲、蒙古、中亞進行研究，建立了另一核心——北亞及其遊牧民。隨著日本戰敗投降，日本歷史學界以唯物史觀為主流進行反思，東洋史也陷於自我反省的氛圍中。江上波夫走出一條截然不同的路，在《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的〈序言〉提到，雖命運已與世界(歐美)連結，仍需先思考日本、亞洲，再與世界連結的順序。<sup>112</sup>因此，江上波夫在面對國家被美國擊潰而投降後，仍希望從自身的東洋史、考古學專業，提出新史觀，將東亞、日本、世界連結，關鍵概念就是「騎馬遊牧民族」。

從江上波夫的學術歷程來看，一、《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總結戰前學術業績，提出「騎馬遊牧民族」概念與「騎馬遊牧民族日本征服說」。《騎馬民族国家》以史料、考古材料為基礎，

---

110 江上波夫，〈江上波書著作集第十卷月報：幻人夢を語る第六號：自画像——私の中の農耕民族と騎馬民族〉。

111 宮崎市定，《自跋集——東洋史學七十年》(東京：岩波書店，1996)，頁30。

112 江上波夫，《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頁1-2。

利用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的研究方法，先考證材料，接著重建材料之間的關係，最後建立假說。二、延續白鳥庫吉以來的農耕——遊牧的東洋史南北對抗論，兩種截然不同的人類生產類型，自律地不斷發展出亞洲數千年歷史。三、將農耕——遊牧對立範式置於東亞文化圈的範圍內考察，並延伸到日本史討論，進而論述日本史裡農耕——遊牧文化的互動情形。以此看來，江上波夫是在東洋史的範圍內持續研究，以日本為匯集點，探討農耕與遊牧文化的關係。

「騎馬遊牧民日本征服說」的提出，雖造成熱烈討論，但仍有許多問題無法自圓其說，以致在 21 世紀後逐漸少為人提及。重要的是，江上波夫使用「騎馬遊牧民」概念，將日本、亞洲與世界連結起來，走出一條有別於當時主流的唯物史觀解釋歷史的方法。他重新使用東洋史中另一半重要的組成——北亞史，將其與日本結合，除了不同於唯物史觀，也不同於那些認為東洋史核心是中國史的學者，再從東亞史與日本史的互動中考察日本史的觀點。江上波夫從北亞史出發的考察，更可延伸到世界史，所以騎馬遊牧民是江上波夫理解歷史的重要概念與媒介。

(本文於 2021 年 6 月 20 日收稿；2023 年 2 月 4 日通過刊登)

\*本文於 2020 年 2 月 27 日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進行報告，感謝所上師長與評論人李明仁教授給與寶貴意見。承匿名審查人細心審閱，學界先進、同儕屢予建議，並在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補助下，於日本收集相關資料，經多次修正始成稿，特致謝忱。惟文責仍由筆者自負。

表 1 江上波夫任職民族研究所期間田野調查、著述、講座一覽表

時間	
1943/01/16	民族研究所成立，擔任第二部所員
1943/04-1943/06	華北、蒙古、滿洲(田野調查)
1943	《滿洲国ニ於ケル諸民族ノ概況ト目下重要ナル民族問題》(與德永康元共著)
1943/05	〈服匿考〉，刊於《民族學研究》
1943/12/11	講題：北方圈民族問題及民族運動(民族研究所講座)
1944/01	〈ヤクートの遊牧性とその原住地に関する一考察〉，刊於《民族學研究》
1944/03	〈匈奴・フン同族論〉，刊於《民族研究所紀要》
1944/03/15	講題：北亞・中亞及西亞民族學(民族研究所講座)
1944/03/18	講題：西伯利亞民族(民族研究所講座)
1945/07-1946/11	華北、蒙古、滿洲(田野調查)
1945/10	民族研究所廢止

資料來源：江上波夫等，〈江上波夫教授主要著作目錄〉，財団法人東方学会編，《東方學回想VIII 學問の思い出(3)》(東京：刀水書房，2000)，頁 71-74；中生勝美，《近代日本の人類学史：帝國と植民地の記憶》(東京：風響社，2017)〈第 5 章：民族研究所：時中の日本民族学〉，頁 360。

表 2 江上波夫重要著作表<sup>113</sup>

編號	年代	著作
1	1934	考古学より観たる遊牧民と農耕民——その經濟的發展階段様相試論
2	1935	内蒙古・長城地帯(與水野清一共著)
3	1948/05	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
4	1948/08	ユウラシア古代北方文化
5	1949/02	日本民族=文化の源流と日本国家の形成 (座談會: 主持人: 石田英一郎・與談者: 岡正雄、八幡一郎、江上波夫)
6	1951	人文科学における考古学の位置
7	1956	北アジア史序説
8	1967	騎馬民族国家——日本古代史へのアプローチ

資料來源：江上波夫等，〈江上波夫教授主要著作目録〉，財団法人東方学会編，〈東方学回想VIII学問の思い出(3)〉(東京：刀水書房，2000)，頁 71-74。

<sup>113</sup> 根據〈江上波夫教授主要著作目録〉，其發表學術性論文是從 1931 年開始，至 1934 年共 4 年間共發表 6 篇論文，分別是〈蒙古多倫淖爾に於ける新石器時代の遺蹟〉(1931)、〈師比並びに郭落帯に就きて〉(1931)、〈極東に於ける子安貝の流傳に就きて〉(1932)、〈徑路刀考〉(1932)、〈匈奴の飲食物に就いて〉(1932)、〈漢代の狩獵・動物の圖樣につきて〉(1933)，均是對考古遺跡的調查，其中數篇收入《ユウラシア古代北方文化》，直到《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1948)才呈現出整合性的史論性論述。參見江上波夫等，〈江上波夫教授主要著作目録〉，財団法人東方学会編，〈東方学回想VIII学問の思い出(3)〉(東京：刀水書房，2000)，頁 72。

表 3 亞洲諸民族分布表

戰鬥方式	生業方式	風土帶
	無	凍土帶
	農耕民族	近東地帶
	農耕民族	濕潤地帶
騎馬遊牧民族	半農半牧民族	山岳地帶
	遊牧民族	乾燥地帶
	半農耕半狩獵民族	亞濕潤地帶
	半遊牧半狩獵民族	亞濕潤地帶
	狩獵民族	亞濕潤地帶

資料來源：江上波夫，〈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東京：野村書店，1948），頁 9-15

表 4 歷史民族一覽表

原始遊牧民	農耕民	山岳地帶 半農半牧民	騎馬遊牧民	獵民	半狩獵 半農耕 民	半狩獵 半遊牧 民
無	仰韶文化	熱河彩陶文化	<u>斯基泰</u>	無	肅慎	丁零
無	殷周文化	綏遠青銅器	<u>匈奴</u>	無	夫餘	隔昆
無	中原諸王朝	甘肅半山文化	塞種(康居)	無	高句麗	烏孫、康居
無		貉、狄、犬戎、東胡、山戎、月氏、氐、羌	鬲昆(丁零)	無	濊、沃沮	高車、鐵勒、 <u>突厥</u>
無		<u>烏桓</u> 、 <u>鮮卑</u>		無	挹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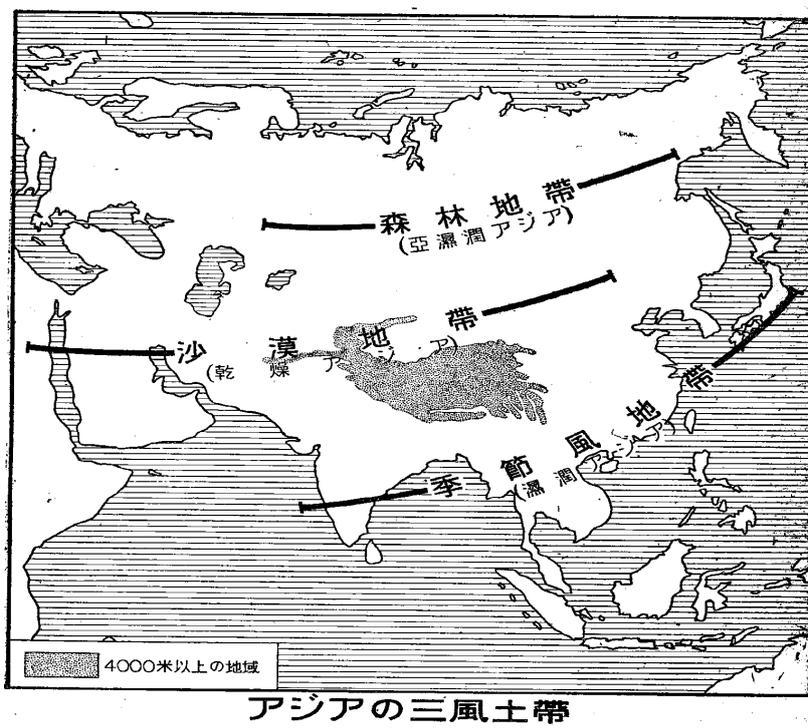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江上波夫，《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東京：野村書店，1948)，頁 32-38、55-57、73、83、120、128。

表5 日本大和朝廷與大陸騎馬民族征服王朝比較表

統治的二元性	日本	連姓，如鏡作、玉作、山等，多以職業為氏，多直屬皇族，廣泛分布於日本。	臣姓，如吉備、出雲、蘇我等，多是日本的土著豪族，與皇族聯姻，擔任中央執政官。
	匈奴	攣鞬氏，單于氏族。	呼衍氏、須卜氏、蘭氏等為聯姻氏族。
	契丹	以國制治契丹(北面官)	以漢制治漢人(南面官)
	蒙古	蒙古、色目	漢人、南人
	滿洲	滿漢並用為原則，但以滿洲為主。	
繼承制度	日本	應神天皇後，不是嫡長子繼承制，而是兄終弟及制。繼承程序需要經過群臣會議議定繼位者。	
	匈奴、突厥、蒙古	實力主義原則，在統治氏族中實施兄終弟及制，繼承程序需經過大人會議推選承認。	
即位儀禮(真床追衾)	日本	大嘗祭，御殿的床設下八重席，使神裏衾而臥，天皇也裏衾而臥進行齋戒，人們相信這時神靈進入天皇身體，使其復活，成為現世神。	
	鮮卑、突厥、契丹、蒙古	君主繼位時都要被載在黑氈子上旋轉，象徵神靈與凡人進行了轉換。	
神話傳說	日本	天皇為天照大神(太陽神)的後裔。	
	鮮卑、契丹、蒙古、新羅、高句麗	建國者均為天神或太陽神之子，或是統治氏族是天神或太陽神的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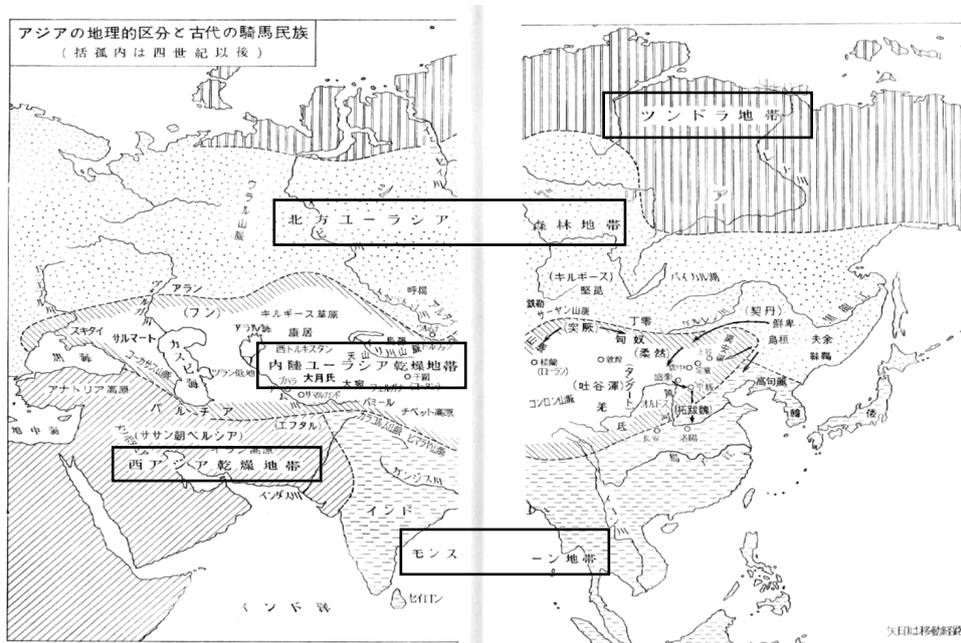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江上波夫，《騎馬民族国家》(東京：中央公論社，1967)，頁199-251。

圖 1 三風土地帶示意圖



資料來源：松田壽男，《漠北と南海——アジア史における沙漠と海洋》(東京：四海書房，1942)，頁2。

圖 2 《騎馬民族国家》所載地圖



資料來源：江上波夫，《騎馬民族国家——日本古代史へのアプローチ》(東京：中央公論社，1967)，頁 6-7。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與報紙

-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145800、総委員会関係雑件第一巻(H-3-1-0-1\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15100 東方文化学院関係雑件/東京研究所関係第一巻(H-6-2-0-5\_5\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14100977500、公文類聚・第六十六編・昭和十七年・第五ノ四ノ属三巻・官職一ノ四・官制一ノ四(通則四)(国立公文書館)。
-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3022791400、御署名原本・昭和十八年・勅令第二〇号・民族研究所官制(国立公文書館)。
- 《朝日新聞》(東京)。

### 二、近人論著

- 〈民族研究所々員任命〉，《民族学研究》，新1：7(東京，1943)，頁767。
- 〈學界彙報：民族研究所の創設〉，《民族学研究》，8：2(東京，1943)，頁273。
- Tanaka, Stefan.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小林行雄，〈上代日本における乗馬の風習〉，《史林》，34：3(京都，1951)，頁173-190。
- 小熊英二，《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東京：新曜社，1995。
- 工藤雅樹，《研究史日本人種論》，東京：吉川弘文館，1979。
- 中生勝美，《近代日本の人類学史：帝国と植民地の記憶》，東京：風響社，2016。
- 中見立夫，〈日本的「東洋学」の形成と構図〉，收入山本武利等編《岩波講座「帝國」日本の學知第3巻東洋學の磁場》，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13-54。

- 井上光貞，《古代史研究の世界》，東京：吉川弘文館，1984。
- 井上直樹，〈滿洲国と滿洲史研究：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所蔵文書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京都府立大学学術報告人文》，70(京都，2018)，頁 157-175。
- 井上直樹，《帝国日本と「満鮮史」：大陸政策と朝鮮・満州認識》，東京：塙書房，2013。
- 今谷明等編，《20世紀の歴史學家たち》(1)日本編上，東京：刀水書房，1997。
- 今谷明等編，《20世紀の歴史學家たち》(2)日本編下，東京：刀水書房，1999。
- 今谷明等編，《20世紀の歴史學家たち》(3)世界編上，東京：刀水書房，1999。
- 今谷明等編，《20世紀の歴史學家たち》(4)世界編下，東京：刀水書房，2001。
- 今谷明等編，《20世紀の歴史學家たち》(5)日本編續，東京：刀水書房，2006。
- 日本国体宣揚普及会，《国体の本義》，東京：日本国体宣揚普及会，1936。
- 日本歴史学会編，《日本史研究者辞典》，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
- 木村茂光監修、歴史学協議会編，《戦後歴史学用語辞典》，東京：東京堂，2012。
- 毛利英介，〈滿洲史と東北史のあいだ：稲葉岩吉と金毓黻の交流より〉，《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48(吹田，2015)，頁 343-363。
- 王曉華，〈江上波夫考察阿倫斯木古城隨記〉，《內蒙古文物考古》，7(呼和浩特，1992)，頁 130-132。
- 古川江里子，《美濃部達吉と吉野作造：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を導いた帝大教授》，東京：山川出版社，2011。
- 永原慶二，《20世紀日本の歴史学》，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
- 白永瑞，〈「東洋史學」的誕生與衰退——東亞學術制度的傳播與變形〉，《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9(臺北：2005)，頁 269-294。
- 白鳥庫吉，《白鳥庫吉全集第八卷アジア史論上》，東京：岩波書店，1971。
- 白鳥庫吉，《白鳥庫吉全集第九卷アジア史論下》，東京：岩波書店，1971。
-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四卷》，東京：岩波書店，1989。
- 吉田順一，〈小澤重男先生の思い出〉，《日本モンゴル学会紀要》，48(東京，2018)，頁 85-86。
- 吉開將人，〈東亜考古学と近代中国〉，收入山本武利等編《岩波講座「帝國」日本の學知第3卷東洋學の磁場》，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 135-174。
- 吉澤誠一郎，〈東洋史學の形成と中國——桑原隲蔵の場合〉，收入山本武利等編《岩波講座「帝國」日本の學知第3卷東洋學の磁場》，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 55-98。

- 江上波夫，〈考古学より観たる遊牧民と農耕民——その経済的發展階段様相試論〉，  
《歴史學研究》，1：6(東京，1934)，頁 409-438。
- 江上波夫、水野清一，《内蒙古・長城地帯》，東京：東亞考古學會，1935。
- 江上波夫，《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東京：野村書店，1948。
- 江上波夫，〈人文科学における考古学の位置〉，人文科学委員会編，《人文特集号  
(2)人文科学の分類》，東京：文部省，1951，頁 18-24。
- 江上波夫，《騎馬民族國家——日本古代史へのアプローチ》，東京：中央公論社，  
1967。
- 江上波夫等著、鈴木武樹編，《論集騎馬民族征服王朝説》，東京：大和書房，1975。
- 江上波夫、森浩一，《騎馬民族説：対論》，東京：徳間書店，1982。
- 江上波夫，《江上波夫著作集 1-12、別巻》，東京：平凡社，1984-1986。
- 江上波夫，〈江上波書著作集第七卷月報：幻人夢を語る第七號：農耕民族不死論〉，  
東京：平凡社，1985。
- 江上波夫，〈江上波書著作集第十卷月報：幻人夢を語る第六號：自画像—私の中の  
農耕民族と騎馬民族〉，東京：平凡社，1985。
- 江上波夫，《学問の探検》，東京：佼成出版社，1985。
- 江上波夫著、張承志譯，《騎馬民族國家》，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
- 江上波夫、佐原真，《騎馬民族は来た！？来ない！？—激論江上波夫 vs 佐原真》，  
東京：小学館，1990。
- 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系譜》，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
- 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系譜(第2集)》，東京：大修館書店，1994。
- 江上波夫，《学問と夢と騎馬民族》，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1995。
- 江上波夫；小堀巖採訪，〈思い出の人びと(6)〉，《學燈》，59：10(東京，1998)，  
頁 42-47。
- 西谷正編，《東アジア考古学辞典》，東京：東京堂，2007。
- 佐原真，《騎馬民族は来なかった》，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93。
- 坂詰秀一，〈日本考古学史拾遺——東亜考古学会・東方考古学協会と日本古代文化  
学会〉，《立正大学文学部論叢》，99(東京，1994)，頁 31-57。
- 坂詰秀一，〈続日本考古学史拾遺：「大東亜共栄圏」の考古学〉，《立正大学文学  
部研究紀要》，11(東京，1995)，頁 1-16。
- 坂詰秀一，《太平洋戦争と考古学》，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年。

- 尾形勇等編、岸本美緒責任編集，《歷史學事典 5 歴史家とその作品》，東京：弘文堂，1997。
- 李慶，《日本漢學史(修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那珂通世著，《支那通史》第1卷，東京：中央堂，1890。
- 和辻哲郎，《風土》，東京：岩波書店，1973。
- 和辻哲郎著，陳力衛譯，《風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 岡正雄、八幡一郎、江上波夫對談，石田英一郎司會，〈日本民族文化の源流と日本國家の形成——對談と討論〉，《民族學研究》，13:3(東京，1949)，頁 207-227。
- 松田壽男，《乾燥アジア文化史論：支那を超えて》，東京：四海書房，1938。
- 松田壽男，《漠北と南海——アジア史における沙漠と海洋》，東京：四海書房，1942。
- 松田壽男博士古稀記念出版委員會編，《東西文化交流史》，東京：雄山閣，1975。
- 松田壽男，《アジアの歴史——東西交渉からみた前近代の世界像》，收入日比野丈夫等編《松田壽男著作集 5 アジアの歴史》，東京：六興出版，1987。
- 芳賀登，《批判近代日本史学思想史》，東京：柏書房，1974。
- 邵軒磊，〈戰前東洋史學之觀念與知識系譜〉，《東亞觀念史集刊》，3(臺北，2012)，頁 335-360。
- 長谷川亮一，《「皇國史觀」という問題——十五年戰爭期における文部省の修史事業と思想統制政策》，東京：白澤社，2008。
- 阿部猛，《太平洋戦争と歴史学》，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
- 柳田國男、折口信夫對談，石田英一郎司會，〈日本人の神と靈魂の觀念そのほか〉，《民族學研究》，14:2(東京，1949)，頁 87-107。
- 柳田國男、折口信夫對談，石田英一郎司會，〈民俗學から民族學へ—日本民俗學の足跡を顧みて—〉，《民族學研究》，14:3(東京，1950)，頁 173-190。
- 宮崎市定，《自跋集——東洋史学七十年》，東京：岩波書店，1996。
- 家永三郎，《津田左右吉の思想史的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2。
- 家永三郎，《激動七十年の歴史を生きて》，東京：新地書房，1987。
- 桑兵，〈東方考古學協會述論〉，《歷史研究》，2000:5(北京，2000)，頁 160-169。
- 桑原鷺藏，《中等東洋史》，東京：大日本圖書，1898。
- 財団法人東方学会編，《東方学回想(I-IX)》，東京：刀水書房，2000。
- 高田時雄編，《東洋學の系譜〈歐米篇〉》，東京：大修館書店，1996。
- 高明士，《戰後日本の中國史研究》，臺北：東昇出版公司，1982。

- 齋藤孝，《歴史学の周辺》，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9。
- 清水昭俊，〈異人、現在の民族学、そして種族史的形成—岡正雄と日本民族学の展開—〉，收入ヨーゼフ・クライナー編《日本民族学の戦前と戦後—岡正雄と日本民族学の草分け—》，東京：東京堂，2013，頁 67-109。
- 鳥山喜一，《東洋史観》，東京：東京宝文館，1926。
- 歴史学研究会編，《証言 戦後歴史学への道—歴史学研究会創立 80 周年記念—》，東京：歴史学研究会，2012。
- 遠山茂樹，《戦後の歴史学と歴史意識》，東京：岩波書店，1968。
- 増淵龍夫，《歴史家の同時代史的考察について》，東京：岩波書店，1983。
- 編集部，〈日本民族学会の成立〉，《民族学研究》，29：1(東京，1964)，頁 58。
- 駒井和愛，《日本古代と大陸文化》，東京：野村書店，1948。
- 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北京：中華書局，2007。
- 藤田豊八，《中等教科東洋史》，東京：文学社，1899。
- 嚴紹盪，《日本中國學史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 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学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会，2002。
- 護雅夫，《遊牧騎馬民族国家》，東京：講談社，1967。

## How Egami Namio Reconstructed the Course of East Asia History, Japan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with the Theory of “Horse-Riding Nomads”

Chang-ting Tsai

Guest Research Associat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The study of *Tōyōshi*, or Oriental History, emerged as a new field of scholarship during the Meiji Restoration. While the roots of *Tōyōshi* can be found i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ese history, it was the scholar Shiratori Kurakichi who expanded the scope of this discipline to include North Asia, focusing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Manchuria, and Mongolia. He proposed the theory that Oriental History was characterized by a conflict between agrarian populations in the south and nomadic population in the north, a theory that was labelled "North-South Dualism."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work of Egami Namio, a third-generation *Tōyōshi* researcher who specialized in archaeology. His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between 1931 and 1945 led him to publish his 1948 book, *Asia: The Formation of Nations and Cultures*. In it, he expanded the theory of North-South Dualism with the category of "horse-riding nomads." Investiga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Japanese people and nation, Egami Namio proposed that the rulers of the Yamato Dynasty originated from horse-riding nomads in Northeast Asia. This idea, known as the "Theory of Horse-Riding Nomads Who Conquered Japan," sparked heated debates on the origins of Japanese culture and people. Egami Namio continued to refine his theory, conducting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Near Asia between 1951 and 1967, which

deepened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rse-riding nomads and agrarian people. His research contributed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y through the le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e also offered unique insights into East Asian history, Japanese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Keywords: Egami Namio, horse-riding nomads, the North-South Dualism, East Asian history, Japan history, world history**